

全球安全秩序重塑与中国的 中东安全治理

唐永胜 余国庆 刘胜湘 余建华

内容提要 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持续增多，进入深度变迁的重要阶段。中东地区作为全球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正处于世界与地区内外双重变局同步交织、叠加激荡的历史转折进程中，安全形势出现了诸多新变化，同时也面临新挑战，尤其是新一轮巴以冲突推高了中东安全风险，对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秩序重塑提出了迫切要求。域外大国基于不同目的与手段介入中东安全事务，对中东安全治理产生了不同影响：美国和英国通过制裁、干涉和军事打击等手段干预中东安全事务，对地区安全秩序具有破坏性作用；法国和德国基于防范中东安全影响外溢考虑，分别采用政治手段和平衡政策加以应对；俄罗斯逐渐巩固其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显示其独特作用。中国积极参与中东安全治理合作，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为引领，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推动中东地区的和解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中国贡献。

关键词 安全秩序 中东安全 中国的中东外交 全球安全倡议
安全合作 安全治理

作者简介 唐永胜，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少将；余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胜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余建华，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在世界变局中寻求全球安全秩序重塑的有效途径

唐永胜

近年来，全球安全形势动荡加剧，充斥着紧张和不安。美国挑起的大国博弈向深度展开，地区冲突增多，乌克兰危机至今仍未进入政治解决的轨道，巴以冲突又燃起战火且难以熄灭，尤其是东欧、中东等地区的安全风险显著增强，并存在失去控制向外传导的重大风险。军事竞争不断向网络、数字、智能、认知等领域拓展。全球安全领域出现的上述变化并非孤立存在，实际上充分反映出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一方面，霸权主义、零和博弈、地缘争夺等强权行径仍然大行其道，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进一步加重，全球安全治理面临重大挑战。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许多国家持续努力探索推进全球安全治理的有效途径，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以构建更加包容开放的全球安全秩序，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正如 2024 年 6 月 28 日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 周年纪念大会主旨演讲中所言，“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起更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①

一 变乱交织的世界对全球安全秩序重塑提出了迫切要求

当前，世界变局深度展开，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全球安全风险加大。不论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安全局势正经历复杂深刻变化，所面临的威胁继续呈现出多样化发展势头，以武力解决争端的事态增多，全球安全治理亟待加强，尤其东欧、中东、非洲等一些地区危机和冲突居高不下

^①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24 年 6 月 28 日），载《人民日报》2024 年 6 月 29 日。

下，短期内见不到解决的迹象。2023年，有91个国家卷入到某种形式的外部冲突之中，与前些年相比有了比较显著的上升。^①美国极力加强对其霸权的护持，推高大国竞争，提升一体化威慑能力，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军事关系，并发展新的防务网络。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美国和欧盟在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的同时，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西方输不起这场冲突，而俄罗斯也退无可退。这种难以调和的立场也充分说明东欧地缘政治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矛盾和权力政治的局限。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芬兰和瑞典先后加入北约，至此北约完成新一轮东扩，成员国增加到32个。

北约东扩是传统地缘争夺和零和博弈的惯性延伸。美国和北约沿袭的是“胜者全得”的思维模式，力图通过北约东扩诱压兼施以巩固和拓展地缘控制范围，限制俄罗斯等一些国家的发展潜力。对自身绝对安全的追求无疑会与其他国家的根本利益发生排斥和冲突，也不符合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要求。实际上，世界变局的一个基本动因就是权力的多维度流散，而这种权力流散会带来利益需求的多元化及差异的扩大。作为结果，全球政治已不可能为特定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提供以自身观念和治理模式主导其他国家发展方向的条件和资源。当前的世界变局并不是简单的周期性循环，在本质上体现为世界体系已进入深度变迁的重要阶段，原有的秩序规范和制度安排已不能为世界范围广泛的和平和繁荣提供有效的支撑与保障。面对未来不明朗的前景和风险，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积极行动起来，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构建更为包容开放的多边制度框架及秩序，为广泛可持续的发展和安​​全提供支持​​与保障。

有人还是习惯于从国家之间力量消长的角度来解释当前世界变局，但国家兴衰的背后往往存在更为多维度的逻辑，且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也有人愿意借用分析世界经济的中长波理论或分析世界政治的长周期理论来解释形势的发展变化，实际上，世界体系变迁带来的深刻系统性影响正在显现。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经济长波理论，注意到了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上升与衰退交替出现的长期波动，试图揭示其中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并认识到长波的存在与科技革命相关联，但对这一理论并不容易做出精确的验证，也没有得到大尺度时空上的历史进程支持，因而带有明显的经验假说性质。而莫

^① 例如，2008年这一数字为58个国家。See 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Global Peace Index 2023: Measuring Peace in a Complex World*, Sydney, 2023, p. 11.

德爾斯基提出的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聚焦到對新興大國與霸權國家關係的分析，尤其分析了國際權力政治中所謂領導者、挑戰者、搭車者等不同類別國家之間的關係，得出了權勢轉移的所謂世紀性規律。這一理論對於幾百年來國際政治的權力交替和霸權有著較強的解釋力，然而問題在於，過於簡約的國家定位和路徑選擇已不能適應全球政治日趨複雜的現實。歷史不會是簡單循環，而當今世界面臨的不僅是力量結構之變，其內在邏輯和性質也正在醞釀深刻變化。實際上，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才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麼“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於各國人民的選擇”。^① 全球政治總是需要發展進化，變亂交織的世界對全球安全秩序重塑提出了迫切要求。

二 不斷積累拓展共同利益，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動力和支撐

世界變局是全球政治發展演進的必然結果，其根本指向應是人類歷史和文明的進步和國際秩序的民主化發展。面對日益嚴峻複雜的跨國性、全球性威脅挑戰，加強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是國際社會必須解決的重大命題，任何負責任的國家都不應規避自己的義務。全球政治中權力趨於分散，更多國家對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期望也將隨之增加。雖然霸權主導和資本擴張的邏輯依然頑固，但是受到更多制約。在世界變局中，影響要素和參與角色增多，作用途徑與方法也多種多樣，新的複合型的權力結構正在形成過程之中。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任何一個大國也包括原有霸權國家都不再可能擁有特定的條件與資源主導其他國家，更不能從根本上逆轉歷史的發展方向。變化的世界呼喚開放包容的多样化的多邊治理模式，以有效應對日益嚴峻的跨國性、全球性威脅和挑戰。其可能的前景就是，“多個權力中心、多样治理模式、多种理念思潮，也都会产生秩序意义。”^② 联合国体系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中仍然重要并具有发挥关键作用的潜力。随着全球安全局势发展变化，联合国在应对国际和地区危机和冲突上已经显现出一定局限性，个别国家强调特权，凌驾于联合国之上，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联合国应该拥有的功能性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0页。

^② 秦亚青：《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页。

和权威性。联合国改革需要让更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大发言权，并使更多中小国家参与联合国决策，体现更充分的公平和效能，以建设更为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变局中难题增多，过于强调自身利益优先，反而可能加重乱象，甚至产生强烈的反噬效应。坚持凝聚和增强共同利益才能实现多样化的协调，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找到破解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及办法。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方面毕竟担负着更多的责任，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及国际热点问题上具有不断增长的共同利益。

全球政治的演进逻辑在发生变化，依靠战争、掠夺、扩张等强权方式拓展自身利益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并将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美国聚焦战略竞争强化同盟体系，放大且加剧了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极大恶化了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对全球安全合作造成严重冲击。实际上，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变革的紧迫性日渐突出，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在变革的进程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只有跟上历史前进步伐，避免沉浸在权力争夺和零和博弈的旧世界，才能为全球安全治理作出更大贡献，而新兴力量的广泛参与已不可阻挡。

当然，变革不可能简单实现，但避免国家间灾难性冲突应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和创新，需要努力实现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的有益平衡，这也是国家间具有潜力的合作领域，而客观评估这一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实中即使形成局部共识，仅仅改变秩序的部分要素，也构成国家关系调整的重要进展。^① 全球安全治理很可能需要经历新旧秩序并存，旧有秩序逐步消解迭代、新生秩序逐步形成并占据主导的历史过程。

三 超越传统权力政治，促进国内安全和全球安全良性互动

中国的持续发展构成了世界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积极倡导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正在为变化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坚持推进开放条件下的国家安全，促进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可为对冲和化解排他性的地缘博弈和大国竞争创造条件，进而牵引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唯有超越传统权力政治的束缚，才能创造条件实现国内安全和全球安全良性互动。“中国坚持在和

^①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ina in a World of Order: Rethinking Compliance and Challenge in Beijing’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 2, 2019, pp. 6–20.

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交汇点。”^①

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集团对抗，努力与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一道，推进安全理念对接和利益交汇，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的社会变革进程，在实质上是做更好的自己，主要表现为社会活力的迸发和治理体系的持续进步，而绝非排他性的扩张。中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目的在于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筑牢基础，并由内及外，有条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有效拓展全球安全合作，为减少全球治理赤字提供支撑和动力，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创新发展。

超越传统权力政治，还必须注重运用利益增量建设性地发展对外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以此有效化解来自霸权国家强加竞争带来的紧张和压力。当前，尽管全球化出现反复乃至倒退，强化全球治理和区域整合依然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国际社会和地区范围对和平与发展的需求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全球安全动荡加剧也从反方向对合作提出了迫切需求空间。即使在敏感的前沿军事科技领域，世界各国也不可能一味强调竞争。比如，人工智能在决策指挥、情报分析、武器系统升级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可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甚至存在使人类失去对战争控制的可能性。如果人工智能与网络攻击深度结合，就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破坏力量。根据中、美元首旧金山会议达成的共识，目前双方已经开启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实际上，人工智能是人类共同课题，发展成果应该共享，带来的风险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

随着力量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和安全议题的不断拓展，亚太地区所面临的安全议题也趋向复杂多元，旧有矛盾难以消解，新生挑战又不断出现，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错综交织在一起，地区安全稳定面临严峻考验，构建和完善地区安全架构已经成为相关国家的普遍愿望。然而，由于亚太地区复杂的地理、历史、文化因素和现实利益冲突，加之各国对地区安全的内涵理解及建构亚太安全架构的路径选择等方面存在明显分歧，地区内尚未形成稳固且为各方普遍接受的地区安全架构，在缩减地区安全赤字、管控危机冲突、降低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第 61 页。

安全风险等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完善的空间。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也是负责任大国，将更加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推动尽快形成公正、合理、包容的地区安全架构。这既可以为实现民族复兴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构筑有效安全依托，也可以为地区安全治理和秩序构建作出更大贡献。

中东安全形势新变化及其困境*

余国庆

长期以来，除了本地区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外，中东地区受到域外大国的深度干预，安全形势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加沙地带大量平民伤亡并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且该地区出现明显的外溢趋势，中东安全形势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一 近年中东安全形势严峻复杂

近年来，在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东地区安全形势虽总体稳定，但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中跌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出现严峻复杂的局面。

中东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但局部冲突不断，恐怖主义安全威胁仍未根除。一方面，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国内的大规模战斗基本结束，陆续进入政治和解以及确定战后国家重建安排的阶段，但交战方之间仍不时爆发小规模冲突。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4月，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冲突并向全国多地蔓延。另一方面，中东地区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努力初见成效，但“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化整为零”继续盘踞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并寻机向北非地区扩散。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当代中东发展”资助计划（DF2023YS46）的阶段性成果。

中东地区安全秩序仍处于调整和重塑阶段，域外大国持续调整对中东地区的安全策略。其主要表现在：一是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的根本趋势没有变化，但仍是中东安全事务的外部主导者。拜登政府与伊朗就恢复《伊核协议》进行谈判的同时，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以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霸权。美国引入印度等新兴域外力量建立“I2U2 四方机制”等做法表明，拜登政府欲通过盟友体系减少对中东安全投入，其本质仍是维持美国对中东的安全主导地位。二是俄罗斯通过军事介入叙利亚问题增加了对中东的安全影响力，与伊朗、海湾阿拉伯国家、埃及、土耳其等国不断深化在军售、军事技术等方面的安全合作。三是英、法等欧洲国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为保障自身能源安全也增加了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投入。2022 年 5 月，欧盟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地区稳定和全球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

中东国家间出现“和解潮”，助力地区紧张局势降温，但深层矛盾仍未完全解决。美国主导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与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了上述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2023 年 3 月，在中国的斡旋与推动下，沙特与伊朗实现了历史性和解，结束了两国自 2016 年 1 月以来的断交状态。受益于此，沙特在 2023 年 4 月派代表团前往也门首都萨那与胡塞武装谈判，也门和平进程取得突破。2023 年 5 月，叙利亚时隔 12 年后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然而，中东国家间诸如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分歧等众多核心矛盾依然存在，为“和解潮”以及中东长期和平与稳定埋下不确定性。

此外，中东国家还面临着气候变化、水资源匮乏、粮食危机、毒品危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与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产生叠加效应，加剧了部分中东国家的安全脆弱性。受到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和国际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中东国家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联合国机构的报告显示，2021 年阿拉伯国家有 5 390 万人处于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较上年增加了 500 万人。^① 特别是 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埃及、黎巴嫩等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中东国家受到严重冲击。此外，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增加，威胁中东国家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2024 年 4 月，极端降雨导致阿联酋、阿曼等海湾国家出现罕见的洪水灾害和城市积水，在阿曼造成至少 18 人死亡。

^① FAO, IFAD, UNICEF, WFP, WHO & UNESCWA, *Near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al Overview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2022*, Cairo, 2023, p. 2.

二 新一轮巴以冲突推高中东安全风险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起“阿克萨洪水”行动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随后对加沙地带开展代号为“铁剑”的地面军事行动。新一轮巴以冲突的持续时间长、烈度高、破坏大，且向地区层面外溢，对中东安全形势产生深刻影响，中东安全形势也出现了新变化。

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成为参与冲突的主要行动主体。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作为“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成员的亲伊朗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在中东地区表现活跃：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与以色列有关的商船，严重危害红海航运安全；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和无人机，与以军在黎以边境紧张对峙；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频繁袭击美军目标，特别是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24年1月袭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一方面，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活动不再局限于在国内实现经济和政治利益目标，近期对美、以目标的袭扰与巴以冲突的走向高度相关，旨在施压以军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表示只要巴以停火且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后就会停止在红海袭击商船。另一方面，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间出现了一定的行动协调，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商船的行动提供了直接协助。伊朗通过“抵抗轴心”来增加在地区层面活动，表明伊朗不愿意正面介入巴以冲突，也不希望因巴以冲突而卷入与美、以之间的全面战争。当然，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袭击美、以目标也有自己的政治盘算，意图通过展示自身军事实力和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坚定支持，以巩固该力量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寻求更多的民意支持。

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冲突形态。以色列国防军在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中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包括运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机来测绘加沙的地道网络，使用“福音”（Gospel）人工智能系统识别加沙的建筑物目标，以及通过“薰衣草”（Lavender）人工智能数据库将多达3.7万名巴勒斯坦人标记为哈马斯成员。^①

^① Yuval Abraham, “‘Lavender’: The AI Machine Directing Israel’s Bombing Spree in Gaza”, *+972 Magazine*, April 3, 2024, <https://www.972mag.com/lavender-ai-israeli-army-gaza>, 2024-05-01.

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则使用武装无人机密集袭击美、以目标，在增加后者防御压力的同时，部分无人机通过超低空飞行等方式绕过防空系统对美、以目标造成破坏。进攻性网络技术也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得到应用，除了以色列与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之间的相互网络攻击外，众多国际黑客组织也根据各自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立场实施网络攻击，中东地区的网络安全形势恶化。新技术的应用增加了军事行动的灵活性，减少了人员损耗和行动成本，在巴以冲突中呈现出的实战效果深化了中东国家寻求获得依托人工智能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的意愿，同时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获得这些新技术的风险也在上升。

以色列与其他中东国家间的关系僵化，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一是伊朗和以色列在战争边缘“冒险”，但行动仍保持一定的谨慎克制。2024 年 4 月 1 日，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领事建筑。4 月 14 日凌晨，伊朗宣布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起了“真实承诺”报复行动，从本土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美、英、约旦等多国协助拦截。伊朗袭击给以色列造成的破坏有限，后续以色列也未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报复，表明双方不寻求升级为全面战争的意愿没有改变。然而，伊、以对抗形态已经出现变化：一方面，这是伊朗首次从本土直接袭击以色列境内目标，展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荣誉的军事实力和远程投送能力，对以色列的威慑上升；另一方面，伊朗与以色列的攻防成本对比严重失衡。专家估计此次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成本约为 8 000 万~1 亿美元，但以色列防御的成本可能高达 10 亿美元。^①二是阿以关系正常化进程受阻。沙特冻结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谈判，突尼斯议会讨论了将试图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行为视为犯罪的相关法案。不过，埃及、约旦、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等依然维持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三是以色列与土耳其在 2022 年 8 月才恢复的外交关系也因本轮巴以冲突受损，土耳其于 2024 年 5 月宣布暂停所有与以色列有关的进出口贸易。^②

^① Andrew Macaskill, “Israel’s Defences Would Trump Iran’s in Any Air War, But At a High Cost”, *Reuters*, April 18,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any-air-war-israels-defences-would-trump-irans-high-cost-2024-04-18>, 2024-05-02.

^② 《土耳其宣布暂停与以色列的所有进出口贸易》，载新华网：<http://www1.xinhuanet.com/world/20240503/7b3ffd5936424a7f98589ad85c46eced/c.html>, 2024-06-02。

三 加沙冲突外溢导致中东地区安全陷入困境

中东安全形势动荡导致外部大国对在中东安全影响力的竞争更加激烈。由于叙利亚、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且地区盟友要求美国加大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投入，美国不得不增加在中东的军事行动。美国在 2023 年 12 月宣布组建代号为“繁荣卫士行动”的国际护航联盟以应对红海危机，并多次在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实施空袭以进行报复和维持威慑。海湾阿拉伯国家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的意愿上升，据称卡塔尔已与美国达成协议将美军使用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期限再延长 10 年，沙特与美国也接近达成历史性的安全协议。俄罗斯虽因乌克兰危机而减少了对中东安全事务的直接参与，但仍是叙利亚问题的主导国之一，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2023 年 12 月访问阿联酋和沙特，并在 2024 年 2 月邀请哈马斯、法塔赫等巴勒斯坦政治派别前往莫斯科谈判，这表明俄罗斯不会轻易放弃对中东地区的安全影响力。此外，英、法、印度等国也趁机增加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英国在巴以冲突爆发后不久就宣布向中东部部署两艘军舰和侦察机，法国也派遣了两栖直升机航母“迪克斯穆德”号（Dixmude）停靠埃及提供医疗援助，印度在 2023 年 12 月向阿拉伯海部署了 3 艘导弹驱逐舰。

巴以冲突的外溢也对中东国家内部政治稳定带来冲击。一方面，部分阿拉伯国家民众不满政府对本轮巴以冲突的反应和立场。华盛顿特区阿拉伯中心的民调显示，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受访者不满阿联酋、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对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立场，如仅有 51% 的受访者对卡塔尔的立场持正面态度。^① 多个阿拉伯国家都爆发了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游行，其中不乏批评政府巴以政策的标语和口号，这导致埃及、摩洛哥、约旦等国叫停了一些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活动并逮捕了部分人员。另一方面，巴以冲突使得部分中东国家的经济困境恶化。以埃及为例，巴以冲突及红海危机导致埃及的旅游业和苏伊士运河收入显著下降，加剧了该国的外汇短缺并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水平。

由于新一轮巴以冲突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局

^① Arab Center Washington DC, “Arab Public Opinion about Israel’s War on Gaza”, February 8, 2024, <https://arabcenterdc.org/resource/arab-public-opinion-about-israels-war-on-gaza,2024-05-01>.

势的受关注度下降，政治和解进程放缓、局势出现反复。2023 年 10 月以来，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政府军增加了对叙利亚西北部反对派武装控制区的空袭，而以色列国防军多次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也加剧了叙利亚的安全压力和人道主义灾难。在也门问题上，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关于结束也门战争的谈判在 2023 年 9 月后就未再进行，沙特担心也门局势升级而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保持行动克制。与此同时，苏丹局势再度升级，2024 年 1 月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宣布拒绝与快速反应部队和解，苏丹内部武装冲突的长期化趋势愈发明显。此外，“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也趁乱卷土重来，增加了中东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性。2024 年 1 月伊朗克尔曼市遭遇炸弹袭击，造成 100 多人死亡，“伊斯兰国”宣布对此事负责。此类袭击的阴影不时蔓延在中东地区的上空。值得注意的是，2024 年 5 月 19 日伊朗总统在直升机事故中罹难，使中东安全形势再临变局，伊朗与以色列关系以及伊朗与美国关系引起关注。

新一轮巴以冲突对中东安全形势的影响表明，巴以问题仍是关乎中东和平与稳定的核心所在。特别是持续半年多的加沙冲突何时停火止战，以及战后加沙地带的治理问题，都将继续影响巴以问题乃至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走向。如果巴以问题不能得到公平公正解决，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命运不能确定，未来还会成为导致中东地区不稳定、不安全的风险所在。因此，本轮巴以冲突将加速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调整和重塑，域外大国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增加、对安全影响力的竞争加剧，域内国家之间通过不断分化组合来实现自身安全利益最大化，但维持与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依然是大势所趋。

中东安全问题中的域外大国因素*

刘胜湘

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 2023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进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研究”(23JZD030)的阶段性成果。

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东安全局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甚至时有出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此起彼伏、相互交织和双重恶化的情形，且传统安全形势更加严峻。中东之所以出现这种乱局主要是因为国家主权原则遭到践踏，国际法得不到遵守。域外势力的干预给中东带来不同的影响。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与俄罗斯，以及中国是影响中东安全局势的几种主要力量，其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目的各有不同，影响各异。

一 美、英长期全面干涉中东安全事务

美国和英国是影响中东安全局势的主要力量。英国是中东曾经的霸权国，美国是中东现在的霸权国，对中东“分而治之”是英、美的外交手段。两国是巴以问题的始作俑者，是造成中东安全问题的源发国家。

美国是影响中东安全局势最大的域外力量，其干涉中东运用的是“楔子”战略，以及与此相配合的经济制裁、军事打击与威慑以及价值观干涉。具体而言，一是实行“楔子”战略，即美国在中东长期支持以色列，致使中东安全局势始终得不到缓和。在历次中东战争中，美国对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在发生新一轮巴以冲突后，美国对以色列给予了全面支持。2024年4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巴勒斯坦提交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申请，被美国一票否决。美国表面上支持“两国方案”，实际上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这是导致中东安全长期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二是采用经济制裁方式。美国在中东制裁的主要对象是伊朗。从1980年与伊朗断交至今，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有增无减：从起初的贸易和金融制裁到全面的经济制裁，从单边经济制裁到多边经济制裁，再到后来的政治制裁和极限施压，制裁逐渐升级。20世纪90年代，美国还专门通过了《伊朗交易监管法》和《伊朗制裁法案》。2024年4月，发生以色列轰炸伊朗驻叙利亚使领馆和伊朗报复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的伊以危机，美国却宣布制裁伊朗的新措施。三是实施军事打击与军事威慑。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中东，驻军约4.5万人，分散在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联酋等10余个国家^①，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力量。美国利用其驻军在中东随意运用武力轰炸其想要袭击的目标，甚至定点清除苏莱曼尼等伊朗高级军官。

^① 王立平：《美要打击胡塞武装？能从哪里出击》，载《环球时报》2024年1月5日。

四是奉行价值观干涉。价值观干涉是美国中东外交的主要手段之一。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推广西式民主。2001 年和 2003 年，美国打着民主和反恐大旗分别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2004 年美国出台“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奥巴马时期，美国提出中东民主过渡计划。2021 年拜登上台后，将推行价值观外交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三大优先任务之一。“阿拉伯剧变”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强行输出民主的结果。

英国是中东具有传统影响的大国，曾长期称霸中东，1956 年英、美中东霸权更替后，英国逐渐成为美国的追随者，英、美言行表现出惊人一致，形成英美特殊关系。1990 年 8 月，英国参与了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2001 年 10 月，英美主导北约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 年 3 月，以英、美为主的联合部队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2023 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发生后，英、美两国声援以色列并向以提供军事援助。红海危机发生后，英、美一同向红海派出军舰。2024 年 4 月，伊朗与以色列危机发生后，英国对以色列表示了坚定的支持。4 月 18 日，英国和美国以防止中东局势大幅升级为由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

美、英对中东不仅是干预，更是干涉，它们的行为对“地区安全环境具有破坏性作用”。^① 美、英在中东随意干涉，长期支持以色列和围堵伊朗，违反了联合国宗旨和基本原则。美国孤立巴勒斯坦激发了哈马斯等武装抗争的决心，美、英干涉中东的结果就是使地区安全局势不断恶化。美、英在中东谋求建立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基于武力和霸权”的中东秩序。

二 近期法、德、俄对中东实施平衡外交

欧洲国家与美国不同，地缘上的靠近使中东国家难民更容易涌向欧洲；^② 经济上联通使欧洲需要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中东不稳必然导致油价上涨，对欧洲的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会产生巨大影响。2023 年 10 月发生的新一轮巴

^① 刘中民、徐张敏：《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载《国际安全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142 页。

^② 刘胜湘、陈飞羽：《拜登上台后美国的中东主导机制调整探析》，载《西亚非洲》2022 年第 5 期，第 37 页。

以冲突已外溢扩散至欧洲，来自中东的难民不断增加使欧洲国家物价大幅上涨，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多次爆发声援加沙的游行示威，呈现出国内局势与巴以冲突共振的情势。因此，总体上欧洲并不希望中东地区陷入冲突。欧洲国家基于自己安全考虑，也需要介入中东事务，这也是法、德等国特别重视中东的主要原因。欧洲国家会尽可能在以色列和中东其他国家之间保持平衡，对中东的干预相对比较温和。2024年1月，美军连续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法国和德国没有跟随，尽管它们决定出兵中东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以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安全。^①

法国在中东有传统影响，历史上曾取得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此外，法国有众多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8%。^②他们代表着法国分别支持以色列和阿拉伯的两股力量，法国的中东政策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2017年5月当选法国总统的马克龙有大国雄心，上台后试图让法国在中东发挥大国作用。当前，法国主要通过政治手段干预中东，为了缓解来自中东难民的压力，曾试图为边缘化的巴以问题提出解决方案。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发生后，马克龙总统访问了中东国家，在以色列强调对该国的全面支持，同时敦促以色列要保护平民。他在会晤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时，批评了以色列对加沙的地面进攻行为。从2023年10月18日到2024年4月18日，在联合国5次讨论巴以问题的决议中，法国没有追随美国，投了赞成票。针对以色列对加沙的无差别空袭，法国不仅进行谴责，而且还对以色列采取了制裁措施。

德国历史上参与中东事务不够深入，扮演的是相对积极的平衡者角色。德国是以色列的盟友，也与巴勒斯坦和伊朗保持稳定关系。正是因为德国与以色列关系紧密，德国在巴以冲突发生后明确表示支持以色列，一个月后朔尔茨又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行的“定居点”政策，并呼吁巴以双方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冲突。^③红海危机发生后，德国总理朔尔茨谴责伊朗对以色列领土的袭击，后来外长贝尔伯克又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

^① “EU Launches Naval Mission in Red Sea, Gulf Regions”,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2402/20/WS65d3c38fa31082fc043b7f77.html>, 2024-05-12.

^② 李靖堃：《英国与欧盟中东政策的未来走向：以英国脱欧为视角》，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5期，第25页。

^③ 焦授松：《巴以冲突加深德国社会裂痕》，载《光明日报》2023年11月25日。

双方强调要就中东问题保持对话。这体现了德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平衡政策。

俄罗斯是中东具有传统影响力的大国。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俄罗斯对中东有较大影响力，一直希望中东冲突降级，试图扮演中立调解者角色。^①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罗斯因“战略透支”已无力对中东发挥更大影响，心有余而力不足。当前，俄罗斯对中东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该国驻军叙利亚。由于叙利亚局势复杂，其国内有各种不同的武装力量，并受到不同外部势力的支持，叙利亚成为中东各种势力的争斗之地，而俄罗斯是各种势力中对叙利亚影响最大的国家，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平衡美国力量的战略支点。

三 中国力促中东地区发展与和解

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中国在中东的影响日益提升，已经从中东安全事务的一个边缘参与者发展为深度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重要角色。中国对中东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加以实施。

一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中东发展。中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受益方，对该倡议普遍持支持态度。2018 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的发布充分说明这一点。“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和沙特、伊朗等很多中东国家在产业发展上实现了对接，2021 年 3 月中国与伊朗签署《中伊 25 年全面合作协议》，2022 年 12 月中国与沙特签署《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 愿景”对接实施方案》，“一带一路”产业链得到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中东地区稳步推进。

二是通过协调外交促中东和平与稳定。协调外交是中国在中东大国外交的主要特点之一，中国已成为各方认可的中东安全事务的主要协调者，因为中国在中东不谋私利，不是中东问题的当事方，更不是中东事务的搅局者，而是中东和平稳定的建设者和维护者。长期以来，中国通过特使机制就中东安全问题协调各方立场。2023 年巴以新一轮危机发生后，翟隽特使频繁前往中东国家，2023 年 10 月 19 日至 2024 年 4 月 28 日，先后访问卡塔尔、埃及、沙特、土耳其和黎巴嫩，就当前巴以问题和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① 顾炜：《百年变局下俄罗斯中东战略的延续与调整》，载《新疆社会科学》2022 年第 4 期，第 110 页。

三是通过中国方案促中东和解。中国就中东安全与稳定提出过不同的中国方案，如2003年关于中东问题的“四点主张”，2007年关于巴以和谈的“五点主张”，2013年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2021年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四点主张”、落实“两国方案”的“三点思路”，以及2023年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三点主张”等，这些主张的关键是促进冲突方实现政治和解。中国支持巴以和解、伊朗与沙特和解，以及哈马斯与巴勒斯坦和解。2023年3月，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跨越恩怨实现“北京和解”，彰显中国为政治解决中东热点问题的独特角色与积极作用。

总体看，错综复杂是中东安全局势的长期性特征，需要域外力量和域内力量协力加以应对。巴以问题、伊以冲突将是未来影响中东安全局势的两条主线，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和伊以危机爆发，中东两极的安全结构愈加明显。一方面，美国对中东安全事务的影响力相对下降。2023年10月和2024年4月，美国在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中5次投了否决票，说明美国的被孤立态势。另一方面，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主导沙特与伊朗和解以及法塔赫与哈马斯和谈是中国影响力提升的标志。英国总体上会站在美国一边，俄罗斯会和中国保持协调，法国和德国可能选择较为独立自主的策略。中东地区甚至因此出现了化解中东安全困局的两种路径：美国等主导的以军事手段和政治干涉为主的路径；以中国为代表的以经济发展和政治协调为主的路径，这将是中东地缘政治军事与地缘政治经济之间的较量与竞争。

变局中开新局：中国以新安全观参与中东安全治理*

余建华

当今，包括中东在内的世界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动荡变革期。与此同时，中国正经历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交汇期。如何在世界百年变局背景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创造有利的国际环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境，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同时，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应有之义，承前启后的中国中东外交无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中东的实践探索。新时代中国对中东地区安全治理的积极参与，体现了一个负责任世界大国的担当作为，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举世瞩目的中国贡献，其深刻影响不仅在于中国与中东双方，对转型变革中的世界体系与国际秩序也具有不容低估的深远意义。

一 内外变局交织下中东依然面临突出的安全挑战

中东正处于世界与地区内外双重变局同步交织、叠加激荡的历史转折进程中。一方面，人类面临历史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尤其是近年来，大国竞争加剧，世纪疫情流行，乌克兰危机升级外溢，世界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尽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同时，“恃强凌弱、强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气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① 全球变局在中东也有相应的地区折射：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全球南方”国家自身实力与国际影响明显增强。原先主宰中东国际格局的传统大国欧美势力正在相对衰退，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和中东地区内部各国的作用日益上升。二是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深度变革，多边主义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成为潮流所向。面对美国霸权软硬实力的衰退，中东正经历冷战后 30 年来地区格局与秩序的调整转型，同样遭受从地区冲突纷争到全球性问题多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伴随网络信息、数字媒体的日益普及，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技术等前沿科技突飞猛进，中东国家与民众从日常生活到国民经济体系也面临各种新模式、新业态。四是国际政治和社会思潮深刻演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与极端思潮在当今中东多国蔓延泛滥。中东地区国家面临机遇与挑战、利好与危机交织并存的世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第 60 页。

界百年变局的国际大环境。

另一方面，中东本身也处于地区大变局之中。20世纪初，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及相伴而随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洗礼，中东地区基本完成现代民族独立主权国家体系的构建。然而，以实现民族复兴强盛伟业为目标的中东民族国家建设历程曲折坎坷，在世界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陷于落后边缘的不利态势。由此，2010年底以来，从北非到西亚爆发了一场波及阿拉伯多国的社会政治大动荡。十年来，这场中东变局见证了中东地区积弊深重的治理危机与发展困局，夹杂着大国竞争博弈、地缘政治冲突、恐怖极端势力肆虐，非但没有迎来美西方向憧憬的中东民主自由的“阿拉伯暖春”，事实上让中东陷入一个战乱动荡频仍、新老热点交织并起的安全困境。^① 不仅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等国战乱仍未看到尽头，2019年至2020年在苏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国也出现政局变革动荡、执政危机重重的“中东变局2.0版”。

世界百年变局下，中东国际关系格局进入了所谓的“后美国时代”，其实更准确地应称之为“后霸权时代”，即指美国在中东减少资源投入，实行离岸平衡的战略收缩，导致域内外大国强国争相填补真空的地区失序、局势动荡的地缘竞争新态势。随着大国战略竞争的激化、乌克兰危机的升级，美、俄在中东的博弈重又加剧，中东在全球战略竞争中的地位提升，代理人战争与冲突增加。另外，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新冠疫情冲击和乌克兰危机影响，也造成中东部分国家特别是一些非油气国出现经济萎缩、资本短缺、粮食和能源危机，乃至民生困难、社会动荡，恐怖极端势力再度抬头。

虽然，近年来中东国家出现自主、发展、和解三股令人可喜的地区潮流，中东国家内政外交的战略自主性明显增强，发展优先成为中东国家的战略重点，特别是地区国家间关系也出现缓和，许多国家缓解矛盾纷争，降低对抗冲突。但是，地区安全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巴以、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等热点危机依然未解，伊朗与美、以对峙抗衡持续紧张。尤其是2023年10月以来，新一轮巴以冲突升级外溢震惊全球，不仅阻滞了地区“和解潮”，且其造成的巨大人道主义灾难以及对地区和世界安全与发展的冲击伤害，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和忧虑。由此，当今中东局势跌宕起伏，其走势充满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地区安全风险依然错综复杂且烈度较强。

^① 参见余建华主编：《中东变局研究》（全两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二 安全合作是继往开来的中国的中东外交重要内容

中国与中东的关系具有悠久古老的历史底蕴与源远流长的友谊基础。两千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就把位于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与中东联系起来，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内涵的“丝路精神”成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友好交往的主旋律。1956 年中埃建交开启了中国与中东友谊历史的新篇章。新中国中东外交在曲折发展中也取得长足进展，但在相当程度上，直到世纪之交尤其是跨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与中东的关系才开始对双方乃至世界真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前所未有地相互接近，中阿集体合作不断全面提质升级。2004 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建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10 年，双方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并在 2018 年升级为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2022 年，在沙特利雅得举行的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双方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当下与未来中国的中东外交的发展，主要由三方面因素所塑就。一是中国自身的发展从改革开放步入当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阶段，中国的中东外交在新阶段、新征程需有新探索。二是中国将对中东外交视为发展中国家外交、周边外交、大国外交以及多边外交等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一环，需服务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总体需要。三是作为成长中的全球性负责任大国，中国必须在中东这一全球重要地缘战略板块的地区治理中，更有担当作为，从总体超脱、韬光养晦的外交转向奋发进取、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国中东外交。

新时代的中国中东外交全面系统，中国与以阿拉伯世界为主要板块的中东国家全方位合作，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外，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同样是中国中东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阿盟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要“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随后他提出中阿合作行动的第一条即为“高举和平对话旗帜，开展促进稳定行动”。他明确宣示，“中国对中东的政策举措坚持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坚持从中东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

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①同时，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指出了全面加强中阿合作五大领域，除政治、投资贸易、社会发展和人文交流四大领域外，第五个即为和平与安全领域。该领域第一条“地区安全”中，明确阐述中方“倡导在中东实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支持阿拉伯和地区国家建设包容、共享的地区集体合作安全机制，实现中东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②

新时代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治理上原则鲜明，政策务实，行动积极，方式灵活，领域广泛。中东变局发生后，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塑造有利于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其中，最为集中和令人瞩目的是对一系列中东热点争端冲突劝和促谈的斡旋外交。中国不间断地派出多位中东问题特使，积极劝和调解。2013年5月习近平主席就巴以问题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以两国和平共处；通过谈判实现巴以和平；坚持“土地换和平”等原则；国际社会为推进和平进程提供重要保障等。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以建设性姿态参与伊核谈判全过程，以更为公正、客观的立场积极开展斡旋，在谈判的重要节点上，中国先后提出了全面解决伊核问题的“五点主张”“四点倡议”等动议^③，弥合各方分歧，以“中国方案”和“中国思路”为伊核协议成功达成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在叙利亚问题上，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西方“新干涉主义”图谋，中国先后数次动用安理会否决权，同时坚持主张推动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呼吁开启包容性政治进程，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始终为推动叙利亚问题妥善解决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并于2016年专门设立叙利亚问题特使推进危机调解。2021年3月，王毅外长就实现中东安全稳定提出中方“五点倡议”：倡导相互尊重，坚持公平正义，实现核不扩散，共建集体安全，加快发展合作。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阿峰

^①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75~376页。

^②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2016年1月），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14日。

^③ 2014年2月中国外交副部长李保东在伊核问题对话会上提出“五点主张”，包括坚持走对话谈判道路；寻求全面、公平、合理的长期解决方案；秉持分步对等原则；营造有利的对话谈判气氛；寻求标本兼治、综合治理。2015年3月王毅外长提出关于推进伊核协议谈判进程的“四点倡议”，包括坚持政治引领；坚持相向而行；坚持分步对等；坚持一揽子解决。

会上提出中阿双方共同推进的“八大共同行动”中，又涵盖粮食安全、卫生健康、能源安全、文明对话、安全稳定等多项关涉中东地区安全治理的合作领域。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方又在 2024 年 1 月与阿盟发布关于巴以冲突的联合声明。2024 年 5 月初，习近平主席前往法国进行第三次国事访问期间，中、法又发布关于中东局势的联合声明。中方强调，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全面停火止战，重中之重是确保人道主义救援，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此外，中国在中东的安全合作还包括积极参加联合国框架下的中东多国维和行动以及恐怖主义问题治理和亚丁湾护航行动等。

中国在中东地区安全治理领域的政策行为，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具体展现，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中东各国的友好合作，以期更好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与中东人民根本利益，以携手构筑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打造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三 全球安全倡议昭示中东安全治理之正道

中东地区安全赤字突出，在动荡变革期的安全挑战严峻紧迫。国家振兴、经济繁荣、人民幸福均离不开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而发展需以安全为前提和保障。2022 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系统阐述了中方促进世界安危与共、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政策立场。^① 这是解决安全赤字、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的全球安全治理良方，为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中东国家及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妥善治理中东地区安全挑战提供正确指引。

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安全倡议中明确强调“六个坚持”，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安全观论述明确了实现与维护中东地区安全、促进新时代中国与中东国家安全合作的原则及路径。

^① 习近平：《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2022 年 4 月 21 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 年版，第 451～452 页。

其一，全球安全倡议提出维护和平与安全，就是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关乎中国在破解中东安全难题的相关认知及其实践的出发点问题，即中国在中东追求塑造该地区怎样的安全？中国与中东国家如何合力实现该地区普遍、全面而持久的安全？上述问题与中国提出并得到包括阿拉伯各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它着眼于实现安全的普遍性、综合性、协作性、长期性，与中东安全问题成因复杂、持续长久等特点相契合，与追求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放包容的世界目标相一致，自然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安全合作的总体理念与理论基础。

其二，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要内涵，也是延续至今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友好合作得以维系的根本基石。超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差异，彼此尊重与支持各国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坚决反对以“人权”“自由”等旗号干涉国家内政的外来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将继续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安全合作持之以恒的根本遵循。在关于叙利亚、利比亚、伊朗等热点问题解决倡议上，这是中国始终不渝坚持的底线，也得到阿拉伯多国的赞同与响应，在涉台、涉疆、涉港等关系中国核心利益及美西方对中方所谓人权问题上无端攻击时，阿方也给予中方宝贵支持。

其三，中东地区安全治理要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几十年来战乱不息乃至加剧的重要缘由，与一些国家强权谋霸，挑动分裂对立，热衷单边强权制裁或以武力解决问题不无关联，结果却是给地区制造更多的危机、动荡与灾难。推进全球安全合作需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国与中东国家在推动解决伊朗核问题以及海湾地区国家间对抗冲突上理应遵循这样的方针。

其四，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安危相互关联、休戚与共，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一国不可能独享绝对的安全，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之正道。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自然也要求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这给中国中东安全合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指导原则，在处理与巴勒斯坦争端紧密相

关的巴以、阿以冲突上，尤其具有针对性和应用性。

其五，中国与中东国家安全合作要秉持公平正义，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为此中国要倡导各方开放共赢，超越零和博弈，致力团结合作，践行平等相待，以包容和解方式相互尊重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如在伊朗核问题上，需要在平等对话协商基础上，兼顾各方合理关切，共建集体安全架构。解决世纪难题巴勒斯坦问题也是如此。中方先后提出关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四点主张”、落实巴勒斯坦问题“两国方案”的“三点思路”，就是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热点问题的积极推动与务实之举，以破解中东安全困境。

其六，当今中东及海湾地区，不仅战乱冲突等传统安全威胁此起彼伏，而且面临着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疫病流行以及来自环境气候、数据治理等各种非传统安全挑战。相应地，全球安全倡议所提出的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生物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则为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及相关国际合作的拓展深化提供了正确路径。

中国的中东外交新征程要从中国、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实际出发，传承与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秉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务实求真的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善于辩证思维、主动求变，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与中东国家和人民乃至国际社会各方“共担维护和平责任，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①，汇聚共筑和平与安全的动力，妥善合作，精准施策，为解决中东如何消弭战乱冲突、建设和平、发展与繁荣的“新中东”这一“世界之问”，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作出中国贡献，以丰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6月28日）。